

## 《文化批判》祝词<sup>①</sup>

成仿吾

一睡千余年的我们睁眼醒来，凡事落在他人很远很远的后面。

百余年来世界史上，我们“中华大国”只是被榨取与被笑骂的对象；一叶一的历史上堆着的，尽是我们全民族说不出的耻辱与痛苦。

这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来算一笔总账。

但是，干什么？从那里干起来？

“没有革命的理论 没有革命的行动。”

现世界的构成，现世界的趋向，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形势——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明瞭的问题。

问题的简化，问题的把握，在动的状态中——这些尤其是我们必须有的努力。

《文化批判》当在这一方面负起它的历史的任务。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

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瞭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

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

全国觉悟的青年，大家起来拥护《文化批判》！

原载《文化批判》创刊号。《文化批判》，月刊，是创造社后期重要的综合性理论刊物，1928年1月15日创刊于上海，主要讨论唯物史观、革命文学等问题。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是第三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1901—1983）、朱镜我（1901—1941）、李初梨（1900—1994）、彭康（1901—1968）等，均是留日学生；成仿吾、郭沫若亦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1928年4月停刊。

## 《流沙》前言<sup>①</sup>

我们在这里就用极简单的话来向读者诸君宣告。

20 世纪的中国的文学家，不是闲散的中国式的文人，不是浪漫时代的歌者，不是发梦的预言家，更不是忧时伤世的骚人，而却是新生活中的战士，自然，我们不敢自命为文学家，但我们只愿做这斗争的走卒。

读者诸君，你们在我们这里或者不能发现你们爱看的风花雪月的小说，不能听见你们所爱听的情人的恋歌——而所有的只是粗暴的叫喊！但你听，霹雳一声何曾有什么节奏？卷地而来的狂风何曾有什么音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暴风骤雨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就应该是暴风骤雨的文学。

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小孩子，自然就 Technique 说，或者还不如老作家，但我们有的是热和力，我们相信惟有无产阶级才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的，惟有受了科学洗礼的无产阶级才最能有明瞭的意识！——这是我们的自信。

近代的文艺只是思想之一种形态 Literature as a mode of Thinking 有了思想，然后才有文学，思想上错误了的文学，我们根本上就不需要它。所以我们在思想上有一致的倾向，在文学上亦同样的应有一致的倾向，——唤起阶级意识的一种工具。我们对于艺术的手法的主张，是 Simple and Strong，愿同我们携手的，请一道来！

全国的爱好文艺的青年们，想你们现在亦正抱着满腔的热忱无处宣泄罢。来，我们大家一齐举起鹤嘴斧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转过方向来，开辟这文艺的荒土！

一月二十五日

原载《流沙》创刊号。《流沙》，半月刊。创造社后期综合性刊物。1928年3月15日创刊于上海。以发表社会科学论文与文艺作品为主。主要撰稿人有华汉（阳翰笙）、朱镜我、彭康、李一氓、成仿吾、黄药眠等。1928年6月停刊。

朱镜我，又名朱竟我，1941年7月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于泾县的靡岭。

## 《新月》的态度<sup>①</sup>

徐志摩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The  
Genesis**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 — Shelley**

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本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

要寻出荒歉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为重见天日的清明，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我们这少

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我们自认还是有我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我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地方，就反面说，也有它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广义的，现代刊物的内容的一个简称）比作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诱，我们把它们列举起来看看：——

一感伤派

二颓废派

三唯美派

四功利派

五训世派

六攻击派

七偏激派

八纤巧派

九淫秽派

十热狂派

十一稗贩派

十二标语派

十三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买卖毒药，买卖身体，是应得受干涉的，因为这类的买卖直接违反康健与尊严两个原

则。同时这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营业，还是一样在现代的大都会里公然地进行——鸦片、毒药、淫业，哪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买卖？但我们却不能因它们的存在就说它们不是不正当而默许它们存在的特权。在这类的买卖上我们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我们正应得觉到切肤的羞恶，眼见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买卖公然在我们所存在的社会里占有它们现有的地位。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我们也看到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列举的许多门类。我们不说这些全是些“不正当”的行业，但我们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很多是与我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我们敢说这现象是新来的，因为连着别的东西思想自由这观念本身就是新来的。这也是个反动的现象，因此，我们敢说，或许是暂时的。先前我们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思想的花式加多本来不是件坏事，在一个活力磅礴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偎傍着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萝。那本不关事，但现代的可忧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盘错的、恣蔓的尽有，这里那里都是的，却不见了那刚直的与普盖的。这就比是一个商业社会上不见了正宗的企业，却只有种种不正当的营业盘据着整个的市场，那不成了笑话？

即如我们上面随笔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除了“攻击”、“纤巧”、“淫秽”诸宗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纵）当然的发展，此外多少是由外国转运来的投机事业。我们不说这时代就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我们指摘的是这些买卖本身的可疑。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的观念，顾着一个容忍的美名，我们往往忘却思想是一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着我们随时的种植与铲除，又是一股水流，它的无限的效用有时可

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还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商。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喷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意愿套上着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坂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壅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见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末了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儿们怕践足的蹊

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间，那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个鲜艳！我们的眼是迷眩了的，我们的耳是震聋了的，我们的头脑是闹翻了的，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我们否认这些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尽有耐人寻味的去处，尽有诱惑的迷宫。因此我们更不能不审慎，我们更不能不磨厉我们的理智，那剖解一切纠纷的锋刃，澄清我们的感觉，那辨别真伪和虚实的本能，放胆到这嘈杂的市场上去做一番审查和整理的工作。我们当然不敢预约我们的成绩，同时我们不踌躇预告我们的愿望。

这混杂的现象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文化的前途还留有一线的希望。这现象是不能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这民族的活力还不曾消竭到完全无望的地步。因为我们认定了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病就有治。绝望不是治法。我们不能绝望。我们在绝望的边缘搜求着希望的根芽。

严重是这时代的变态。除了盘错的、恣蔓的寄生，那是遍地都看得见，几于这思想的田园内更不见生命的消息。梦人们妄想花草的鲜明与林木的葱茏。但他们有什么根据除了飘渺的记忆与想像？

但记忆与想像！这就是一个灿烂的将来的根芽！悲惨是那个民族，它回头望不见一个庄严的已往。那个民族不是我们。该得灭亡是那个民族，它的眼前没有一个异象的展开。那个民族也不应得是我们。

我们对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发见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的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徬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

我们要把人生看作一个整的。支离的、偏激的看法，不论怎样的巧妙，怎样的生动，不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要走大路。我们要走正路。我们要从根本上做工夫。我们只求平庸，不出奇。

我们相信一部纯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个需要。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纯正的思想，是我们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后自然的产物，不是租借来的零星的工具，也不是稗贩来的琐碎的技术。我们先求解放我们的活力。

我们说解放，因为我们不怀疑活力的来源。淤塞是有的，但还不是枯竭。这些浮荇，这些绿腻，这些潦泥，这些腐生的蝇蚋——可怜的清泉，它即使有奔放的雄心，也不易透出这些寄生的重围。但它是在着，没有死。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汨汨地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瘀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滞水的池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谁说这“一举手一投足”的勤劳不是一件伟大事业的开端，谁说这涓涓的细流不是一个壮丽的大河流域的先声？

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计较稻穗的饱满是在哪一天。无常是造物的喜怒，茫昧是生物的前途，临到“闭幕”的那俄顷，更不分凡夫与英雄，痴愚与圣贤，谁都得撒手，谁都得走；但在那最后的黑暗还不曾覆盖一切以前，我们还不一样的得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分？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

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往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像，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则生命的势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罢，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罢，我们想像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

原载《新月》创刊号。《新月》，月刊，1928年3月创刊于上海，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先后主编。主要发表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主要撰稿人有胡适、罗隆基、陈源（西澧）沈从文等。1933年6月停刊。

按：《新月》的版式在现代期刊中很有特点，既不是16开，也不是32开，而是近于正方形，封面上有用古宋体写着“新月”二字的黄签。据梁实秋回忆：“《新月》模仿了黄皮书的形式，却很少人注意到，因为国内很少人看到过黄皮书。”“黄皮书”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一本文艺杂志《Yellow Book》季刊，刊登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出版时间为1894—1897年。

## 《独立评论》引言<sup>①</sup>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为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地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原载《独立评论》创刊号。《独立评论》，周刊，主编胡适、丁文江，1932年5月在北平创刊，天津、上海、南京、西安、兰州、武昌、开封、安庆等主要城市都有代售处。这是一份政论性刊物，以刊登政论为主，也刊登杂文、游记（丁文江的

《漫游散记》、《苏俄旅行记》)书评、人物介绍等。《独立评论》出版时期正是日寇加紧向我国侵略、学生爱国运动高涨的时期，胡适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对这些方面的“独立”看法。他在《我们可以等五十年》一文中说：“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不可因为目前的迫害，就完全牺牲了我们将来的在这世界上抬头做人的资格”，他举例说，比利时当年被德国占领后，四年后才得以复国；法国战败后，割地两省给普鲁士，四十八年以后才得以收复，因此，“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年，我们也许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他连续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再论学生运动》中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丁文江也发表了不少政论，在1933年1月15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35期上，丁文江发表了一篇长文《假如我是蒋介石》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是：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1936年11月，《独立评论》第229期上发表了反对日本筹划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议论，被国民党北平当局责令停刊，第二年4月份复刊，3个月后“七·七事变”发生，即终刊。

胡适对创办《独立评论》的原因有如下说法：“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又，《独立评论》创刊号《引言》中提到的“八九个朋友”，大致是指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任叔永、陈衡哲等人。

## 《现代》的始末<sup>①</sup>

施蛰存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吴淞发动了侵略战争。以蔡廷锴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阻止了日本军队的推进。由于蒋介石的畏敌保命，不惜卖国投降，不久就和日本军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结束战争。这次战役虽然不到三个月，但使上海的经济、文化、民生，都遭受到很大的破坏，所有的文艺刊物，几乎都停止了。

日本军队撤退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文化出版事业正待复兴。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计划创办一个文艺刊物，以发展书局的营业。这家书局，在“一·二八”战争以前，曾出版过几种左翼文艺刊物如《拓荒者》、《大众文艺》等都被国民党官方禁止了。在官方的压力下，他们又不得不出版宣传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这个刊物，幸而被日本侵略军的一炮轰垮了。

现在，这两位老板，惊心于前事，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于是他们物色到我。我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而且我有过编文艺刊物的经验，他们以为我是最符合于他们的期望的编者。当时，我和朋友们办的水沫书店已受战事影响而歇业！我闲着无事，就接受了现代书局的邀请，为该书局编辑一个大型文学月刊，刊名就叫做《现代》。

第一期《现代》在 1932 年 5 月 1 日创刊，当时是上海唯一的文艺刊物。我在《现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一个《创刊宣言》，说明这个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而“不是同人杂志”。又申明这个杂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又说：“本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这些话，只是间接地说明这个刊物没有任何一方面的政治倾向，刊物的撰稿者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出版家现代书局来说，这样一篇《创刊宣言》是必要的，它可以保证不再受到因出版政治倾向鲜明的刊物而招致的经济损失。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阵营中的文艺刊物，几乎都是同人刊物。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一个学会或一个社，办一个刊物，为发表文章的共同园地。每一个刊物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都是一致的。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发生分歧的时候，这个刊物就办不下去。《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都可为例子。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别人编辑。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现代》绝不可能编成为一个有任何政治或文艺倾向性的同人杂志。

但是，许多人一向看惯了同人杂志，似乎不能理解文艺刊物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花镜，对于我主编的《现代》，总爱用同人杂志的尺度来衡量。早在 1934 年，已经有人讥讽这个刊物是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混血儿。谷非（胡风）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来

评论《现代》上发表的创作小说，好像巴金、沉樱、靳以等作家的创作都是遵循“第三种人”的理论创作的，显然他也把《现代》看作“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了。解放以后，有些文学史家、理论家，提到《现代》，有的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刊物”，有的说是“一度以第三种人面目出现”，有的说它“提倡所谓‘现代’观念”。我觉得他们中可能有人没有看到过全份《现代》，只好望文生义地说一通。不过这也难怪，30年代的刊物，今天已所存无几，一般人确是不容易见到了。

现在，上海书店愿意影印全份《现代》，这是一件大好事，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已成为文学史陈迹的刊物能向文学史家提供研究资料，看看这个刊物在当时文学界的作用和意义，给一个不多不少的评价。

全份《现代》，共计出版了三十四期。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二期，是我主编的。它们可以代表我的文艺态度。第三卷第一期起，至第六卷第一期止，共十九期，是我和杜衡（苏汶）<sup>②</sup>合作编辑的。第六卷第一期出版后，我和杜衡都辞去了《现代》编务，并脱离了现代书局。书局也经过改组，换了老板。《现代》由国民党派来的编辑主持<sup>③</sup>，出了三期，维持不下去，随着现代书局的歇业而废刊了。上海书店把包括最后三期的全份《现代》都重印出来，可以说明，像《现代》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不属于左翼文学的刊物，也还是要在挣扎中求生存，而最后还是为国民党所不能容。

1983年10月

本文原是施蛰存为上海书店于1984年影印《现代》（全份）而写的序言，经《出版史料》编者征得作者同意，于《出版史料》1984年第3辑上发表。《现代》月刊，主要以刊登文学作品、文学评论为主。

②杜衡（苏汶）（1907—1964），原名戴克崇，还曾与施蛰存共同创办《瓔珞》杂志。1935年，杜衡与杨村人、韩侍珩创办《星火》杂志，对抗左翼文学。

指1935年3月起先后由李贲华等出任主编，《现代》改为综合性刊物，设有现代论坛、国际政治经济、中国经济文化、中外文化消息、妇女问题、青年生活引导、创作、书报评论等栏目。又，1978年施蛰存曾向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谈及现代书局和《现代》杂志，现摘录若干内容如下：“后来，由于某一种需要，杜衡加入《现代》杂志，编辑为两个人的名字，这以后，《现代》就真正成了‘第三种人’的杂志。在杜衡加入不久，我事实上已退出了，后来现代书局因洪雪帆与张静庐闹翻了家，张拿现款，洪分到店面和账面上的钱，其实账面上数字虽大，实际上根本收不回钱，这样，洪雪帆就搞不下去了。这时，国民党就让徐朗西来当经理，这人是上海流氓头子。李贲华、汪馥泉都编过《现代》。”“我和鲁迅是先通信，后认识的，通信是我们办了水沫书店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时。”“刘呐鸥办水沫书店时，冯雪峰常来，那时大家在考虑办些什么书刊，冯建议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还搞《新文艺》杂志。”见《施蛰存谈现代杂志及其他》，载《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又，并请参阅本书的《我和现代书局》一文及该文的注。